

探索哲学的繁荣之路

——与《哲学动态》记者谈

问：最近在做什么？

答：最近两三年里，除了教学等日常事务外，主要是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继续参加哲学原理方面的改革和发展研究与讨论。

问：您在这方面的文章，我已陆续看到一些。显然，您多年来一直是力主“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

答：是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

问：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近年来很引人注目，也发生了一些波折。请您结合现在的形势谈一谈，这场争论的意义何在？

答：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理论内容，许多同仁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做了不少说明，现在不必重复。我想说的是，这场争论的意义，实质上是涉及到在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问：您说的“有效地”是指什么？

答：有效当然是针对“无效”或“反效”而言的。我觉得，我们过去所讲的哲学原理理论，在飞速发展的人类社会实

践和科学技术面前，已经显露出不少弱点和缺陷，它在贯彻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和巨大魅力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也不能充分适应现实的需要，给人以更多的智慧、启迪。虽然它的主要基础和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仅固守它们、重复它们，甚至把一些本来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方法和结论，也当做马克思主义来坚持，这样的“坚持”至少是无效的，而且往往收到反效。

问：所以您觉得必须要用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和发展它，才能有效地坚持？

答：对。因为争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内部进行的，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坚持”，所以，我想突出强调一下实际效果方面。实践是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的标准。我认为，实践已经证明，“实践的唯物主义”主张确实是一种在新的形势下有效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益尝试。

问：请再说明确一点。

答：这些年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所展开的争论，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如实践的地位和作用、主体性、价值、主体间性和社会交往、反映论和创造性、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等等。在争论中，不同观点交锋，使问题不断地深化了。仅以主体性问题为例，它在争论中的深化就包含了这样几个阶段：先是涉及到认识论，包括反映与选择、建构、创造的关系；后来在价值论上形成热点，出现了不少成果；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的客观性与认识主体性问题的争论，引出了主体间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又由于上述讨论，引发了关于实践中的社会交往和如何看待

人的问题，这就走向了历史观的广阔领域。这种深化不是很有意义吗？争论各方都有自己的贡献。当然，其中也有理论上的是非。

问：讨论的深入对现实有什么意义？

答：我觉得它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回响和演练。从内心深处说，我真诚地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哲学基础和理论特征，正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问：哦？这种说法很新颖……

答：也很大胆，是吧？不过我还是这样认为。当然，作为哲学理论，现代的实践唯物主义也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实践的反映，它也体现了对现时代人类世界发展特征的哲学理解。它是直接与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时的基本精神和方法相衔接的。这需要专门写一本或几本书来说明。

问：我还是想请你就实践唯物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再谈一谈。

答：这个题目也不是三言五语就能说全面的。但有一点请注意，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思想方法和理论前提下，有许多是我们过去的哲学教科书没有讲到、或没有讲够、甚至是难以讲通的，而对于实践唯物主义来说，却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

问：请举个例子。

答：不要纠缠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而要以实践为标准，只要符合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就要大胆地探索 勇于实践 在实践中把握方向——这一思想，就包含了丰富的哲理。其中充分体现了人的

活动的主体性，实践的主体性、价值的主体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它对陈旧的僵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冲击。按照过去一些教科书的讲法和一些人的理解，姓“社”姓“资”问题之所以必须处处强调，是因为这涉及到“事物的固有属性”问题，而事物的属性又决定着人的活动性质和结果。它不懂得，或者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事物的存在和属性不依赖于人，但事物对人的价值、人同事物相互作用的效果，却是主要取决于人自己的。且不说是否任何社会现象都有那种属性，都能问出个姓“社”姓“资”。就说确有这种属性，问明了它姓“社”姓“资”，然后又怎样呢？从实践角度考虑，能说姓“资”的一概都要不得、不能用，而姓“社”就一概都好，都要干吗？譬如公有制，人们通常认定它姓“社”（其实原始公有制就不姓“社”）那么是不是公有制程度越高，越是“一大二公”，我们就越该搞？这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同样，私有制，雇佣劳动等，被认为姓“资”（其实在奴隶和封建社会也有过），那么是不是凡私有制、雇佣制的东西，我们就该一概拒绝、排斥呢？如果这样，那么改革开放还搞得下去吗？只要不是空谈，而是实践，这些问题就不能回避，而必须做出分析、选择和回答。可见，凡事要问一问它“姓什么”，不如凡事想一想怎样才“有利于”我们更明确、更深入、更具有实践的意义。话说到这里，就应该讲讲“事在人为”的道理了。“事在人为”在旧观念看来是有唯心主义嫌疑的，而对实践唯物主义来说，却是科学的主体性观点、实践观点的一个应有结论。所以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和它

的主体性原理，是引导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意，这个“实事”不仅仅是指外部事物、客体，也包括人、主体、自己的实际）的。

问：好，这个问题先谈到这里。请问，您认为，这场讨论今后会怎样？

答：重要的是建设。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和阐述，虽然意义很大，但目前所做的工作还仅仅是初步的。它本身的建设，由于种种原因，迄今还不能说已经全面展开，它现在所达到的水平，还远不能与它的创始人马克思相称，更不能说已经充分适合时代和社会实践的要求。相反，现在是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头。

问：您指的是——

答：在国内，十四大已经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已经走向了蓬勃健康发展的新时期，而我们哲学上所做的思想理论准备，相比之下就显得很不够。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哲学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提出了哪些问题，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等等，还没有一个较完整、深刻的说法。相反，在哲学界却出现了两种令人忧虑的心态。

问：哪两种？

答：一种是无动于衷，没有反应。内心深处是以为，不管市场不市场，反正自己那一套概念到什么时候、哪里都能用，因此忽视现实，脱离时代。这种心态可能是少数；另一种则相反，被滚滚而来的“市场”浪潮裹挟而下，认为哲学要面向市场，就是哲学工作者要纷纷“下海”。这种心态背后的潜台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哲学不再

需要”。我觉得，这两种心态的结果，都意味着放弃哲学应负的社会责任，造成哲学的真正失落。

问：确实听到一些人对哲学命运的担心。他们认为，眼前最重要的，是哲学系、哲学工作者的“生存”问题。因此首先考虑的是创收、“下海”，您怎么看？

答：“搞活哲学”与“搞活哲学系”不完全是同一回事。有些人觉得，要搞“活”哲学系，就得先不搞哲学或搞“死”哲学。我觉得这是个悲剧。当然从另一面看，我国过于庞大而低效率的专业哲学工作机构，通过这种形式消肿，使之适合国情和社会的需求，也是件好事。但是就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它的，决不是它的淡化和削弱，而恰恰是要它更繁荣、更有生命力。今天出现的某种“危机”，实际是以往哲学工作发展不健全的结果。

问：此话怎讲？

答：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哲学界的“近忧”，正是过去长期缺乏“市场意识”的结果。最近我听到的一种说法很有代表性：“只听说过哲学是战场，没听说过哲学还要进入市场！”其实，“战场”也是一种市场；“市场”也是一个战场。过去把哲学当作战场并不错。但是把哲学研究工作当作军队打仗那样，只等着上级指挥，那是一种单纯依靠行政权力体制建立的哲学工作体制。其实，哲学除了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外，它又是一门科学研究事业，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有是否真正有效地占领“市场”（也叫“阵地”）的问题。科学研究与市场也不是彼此排斥的。历史

已证明，市场竞争需要科学，科学本身也存在着类似市场那样的竞争机制。关键还是要确立哲学工作中的“市场意识”和相应的体制。

问：什么是哲学工作的“市场意识”？

答：简单说，就是要面向现实、面向社会实践、面向未来、面向人民群众。要把哲学当做科学来对待，也要正视现实，深入地研究和回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并且这些回答要唯一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以真正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负责，对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有益为最高标准。总之，哲学并不是靠别的什么，而是靠自己为社会所做的贡献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靠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支持而生存和发展。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一再说过，理论的命运，“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①用这种观点看待哲学，我觉得就是哲学工作的市场意识。

问：您的意思是说，哲学工作者有了市场意识，并按它做到了，那么就是不“下海”，也可以面对市场、进入市场了？

答 是的，不过这是广义的“市场”。哲学要能做到让人确实感到该学，学了有益、有效，那么在任何市场发达的条件下，都不会发愁自己的生存。几千年来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哲学是不会“死”的，死去的只是丧失了生命力和竞争力、失去了“市场”的某些哲学。说到底，哲学和哲学工作者的命运，首先还在于自己。

问：难道社会环境就不重要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页。

答：当然不是。国家和社会各界真正理解哲学，懂得自己对哲学的需要，因而也知道应该怎样支持和保护哲学工作、支持和保护什么样的哲学工作，这一点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这个国家和社会在思想文化、精神文明方面发展程度和特征的一个试金石。不过我们不能只是“等、靠、要”。

问：按照您所说的“市场意识”，您打算做些什么？

答：这就是我近年来所做的另一件事：进行当代价值观念及其变革的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

问：这是您在发表《价值论》一书以后的工作继续吧？

答：可以这样说。但是价值论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整理古今中外价值论思想，建立各方面的应用价值理论等等。相比之下，我觉得当代是一个价值观念大变革的时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人民更迫切需要有关价值观念的理论和对于当前价值观念变革状况、趋势的分析、预测、导向。因此就放下了其他计划，先从这里做起。这也算是努力跟上时代、面向现实吧！

问：这个课题显然已经“热”了起来。不知您的进展如何？

答：这项工作比看起来要艰巨、复杂得多。得从头做起，确定什么是价值观念，它的结构、特征、功能和变化方式一般来说是怎样的。这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工作。然后，我们搞了两轮社会调查，通过问卷和访谈积累了一些资料数据。经过初步分析处理，对我自己很有启发，也很令我振奋，觉得哲学在这里很有用武之地。这项工作也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大力支持。

问：什么时候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让大家一起分享？

答：个人的力量很有限。我所担心的只是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不够，在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上误人子弟。所以还需再下一番功夫才能问世。如果有很多人从事面向现实的工作，我想我们的哲学不仅不会萧条和停滞，反而会更活跃，更有益于社会，从而更加繁荣。

（本文原载《哲学动态》 1993 年第 1 期）

哲学和哲学观

思考 21 世纪的中国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不能忘记首先要思考：作为中国国家哲学和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 21 世纪？而这实际上又取决于一定哲学观的贯彻和体现，即在此期间，人们将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它，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保持和发挥它的生命力，实现它与时代俱进的发展和繁荣。目前的情况表明，为了创造和迎接 21 世纪中国哲学、首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繁荣和发展，我们应该重视对哲学观的反思和审视，需要从确立和加强科学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建设入手。

哲学，作为人类最高抽象层次、最普遍思维方式的理论学科，不能不包括一定哲学观（或称元哲学、哲学学、哲学社会学等）的内容，即哲学是什么，它同人类、社会和个人的生存发展有怎样的联系，价值何在，哲学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方式和规律如何等等。总之，它是关于哲学学科本身的基础、性质、特征、功能及其与人类历史实践相互关系的理解和说明。基于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回答，才有了人们对待哲学的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态度、方式。而能够给予这些问题以一定理解和回答、并指导人们的态度和选择方式的学说，归根到底又只能是哲学。所以，哲

学观的建设从来都是哲学建设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多年来，我们缺少比较系统一贯的哲学观研究，因此，有许多问题还不是很明确、很自觉的。沿用多年的教科书基本采用了前苏联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固定模式，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主义”的分立和并列为框架的；同时也就大体上接受了它的哲学观——其主要特点是高度强调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和工具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解放思想，面向国内外的实际，围绕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建设性的研究和讨论。例如：如何评价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它是否准确或基本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精华？如何理解和处理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怎样看待实践观点的地位，用马克思的一个提法，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否合适？实践唯物主义的确切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什么，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如果用一套概念范畴体系把它们内在一致的科学内容整理和表达出来，究竟应该以什么为逻辑的重点和结构的核心，是存在论（本体论），还是认识论、辩证法，或价值论、实践论？等等。在研究和争论中暴露出，进一步的探索必然会遇到来自理论自身的困难。并且问题的难点和焦点所在，目前已主要不是个别观点、原理如何理解和表述，而是一些更为基础性、前提（背景）性、整体性和普遍方法性的问题。问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宏观面貌和根本原则的整体把握和要求，也涉及用以构筑和解释哲学原理体系的理论和逻辑前提、方法、规则本身的论证。它们更多是属于哲学观层次的问题。

例如目前有这样几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一个是如何估价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形势。除去社会

上有些根本不懂、也不愿了解其性质和意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哲学无用”这种情况不谈，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判断。例如有人觉得，当前主要是“坚持”与“否定”之争，认为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和维护其原有的基本理论面貌及其社会权威地位，是我们哲学面临的主要现实形势，只有坚持住才能巩固和发展，因此就要把建设的重点放在批判和抵制对它的各种否定、偏离和轻视上；也有人觉得，当前主要是“发展”与“停滞”之争，认为目前的客观形势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而且能够（或者正在）实现一种时代性的重大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坚持，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认识工作要跟上去，防止僵化和停滞。从理论上说，这两种判断的出发点和立场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能够彼此统一起来。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两者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分歧往往比较尖锐。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我觉得这里的关键还在于究竟以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来看问题，即双方各自所说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它的“本来面貌”和精神实质是什么，应有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何在，以及应该以什么为根据和尺度来评价它的发展形势，等等。而这些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所要说明的。

另一个是如何看待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关系。这个问题与前者紧密相关，或者说就是前一个问题在当前表现的焦点。每一种哲学作为一定时代精神的产物，总是必然地反映一定人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定价值观念体系而成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或政治性；但是总体上，哲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大学科领域，又有其普遍的对象、问题、方法和规则，反映人类实践的最一般特征和逻辑，并且必然遵循科学

知识、理论和真理发展的共同规律，这又成为它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本质和功能。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哲学能够不断繁荣发展的保证。但是，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把两者简单地割裂和对立起来的偏向，就是只讲其中一面，否认另一面。历史教训证明，无论“非意识形态化”还是“全意识形态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都是极端有害的。“非意识形态化”意味着放弃应有的社会立场和人文责任，固然可以导致背离或抛弃马克思主义；“全意识形态化”意味着把它当成仅仅是一种反映人们自己利益和价值追求的体系，而不是一个严密的科学理论，同样也可以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所用。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对此，我们也必须有科学的积极的研究和理论说明。

还有如何看待哲学“体系”的问题。对于要不要进行哲学原理体系的改革和重建，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任何一种深刻的、成熟的哲学思想，在其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对象和内容的层次、逻辑的结构和规则、方法和应用的特征，以及价值取向和现实意义等方面，都表现为自身内在的完整、严密和一贯性，即自成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一点更不能否认。当然要区分“体系”的两个层面：一是如上所说的“思想体系”本身；二是论证、阐释或发挥这一思想体系的“叙述体系”，即表现在教学和宣传中的概念范畴、观点方法系统。两者之间既不完全等同，又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把握两个层面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当前关于哲学原理体系改革和发展的研究，主要是指“叙述体系”。

在思想体系上，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在人类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着的，一个开放的、富有生命力的科学和革

命的思想系统。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是某些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公式和教条的集合，而只能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应用体现出来，得到贯彻和展开，并受实践的检验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保持其一贯的面貌和精神实质。正因为如此，表现为一定的叙述体系，也必然具有历史的、具体多样化的形式。即使是对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原则的论述和强调，也总是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有所转移的。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设想：假如由马克思本人来写一本教科书，他很可能是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样的构思；而由恩格斯来写，则可能以《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和《自然辩证法》等内容为思路；如果由列宁来写，那么大体可从《哲学笔记》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书中看到一定线索；斯大林已经留下了他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毛泽东也曾在延安写过一本《唯物辩证法大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其中两章），并用它来讲课……这足以说明：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叙述，在保持其实质不变的前提下，也可以并且应该有不同的叙述体系，对其中每一种都不应取简单化绝对化的态度。叙述体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并不等于背离或抛弃原有的思想体系，相反，它正应该是思想体系生命力的展开和体现。所以，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责任给自己规定这样的任务：不断深化对其精神实质和生命力的把握，解放思想，根据时代和实践的特征、经验和成果，改革、探索和完善现有的叙述方式，使之更适合于马克思主义活的思想灵魂。

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有些同志主张不要搞体系，以避免僵化和教条化。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则有几点不够切合实际。第一是如何对待原有的体系？现行教科书体系，总体上是以斯大林的框架为底本发展而来的。因为不管

怎么说，不论对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它对我们来说终究是“第二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经过前苏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既未能看到更多的马克思原著、又远离今日世界和中国实践背景下消化和整理的理论模式，毕竟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如果说已往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在今天也应该看到它的使命已经完成。然而，由于多年的大力推行，它的某些观念的影响至今仍然很深，不少人甚至把它当作唯一的或既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着眼于从体系上突破和改造旧的模式，代之以我国自己整理和阐述的、更富有时代精神的思路和风格，那么事实上就等于维持原有体系不动，从而放弃了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力和责任。

第二是如何对待 20 世纪以来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巨大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一点上特别有害的观念就是认为，似乎一切真理和基本原理都已包括在我们原有的哲学体系之中了，一切现实的发展都只是在进一步证实它而已。持这种观念，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当然，体系未必都一定带来僵化，问题是要使这个叙述体系符合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开放的精神实质。上述观念则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旧体系缺陷的一个产物。而我们关于体系思考的任务，正是要克服那些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整理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最深刻、最重要、最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并整理和吸收当代人类文明的新成果，用以充实和丰富它，使之充分代表走向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和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如何构建我们走向未来的民族思想文

化的基础和灵魂。展望 21 世纪的中国，我们确信将赢得经济和科技的繁荣昌盛。那么在思想文化上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成果领先于世界？仅仅靠几千年前形成的古代文明和儒家传统，或者靠全盘西化，在文化上跟着别人走，显然都不行。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包括建设以当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哲学无疑是这个新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我们不能忽视自己当代的思想成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实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生动体现。由于我国在当代和未来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充分认识和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哲学基础和特征，使之不仅成为我国走向 21 世纪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成为人类哲学和新世纪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这是我们当前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出发点和实质。

近十几年来，随着改革和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问题，已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同时，近几十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发现、整理和重新翻译出版，也为我们正本清源，依靠第一手资料学习、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把中国和世界当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当做自己的主要问题；在认真总结经验，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摒弃各种糟粕的同时，注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哲学研究，其中包括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关系的研究、东西方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一条建构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路，使之体现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与特色，为在新的世纪里创造更加辉煌的
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打下基础。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3 期）